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行动路径和重大意义

余海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政治功能,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成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关键密钥。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清晰的历史脉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成为现代化征程的起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奠基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现代化的道路中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探索阶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更加清晰、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路径

以“共同富裕”锚定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具象化使命化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这一实践本质上是我们党围绕“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通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使命表达功能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生动体现,即“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目标,更是党对人民承诺的政治宣示。

以“高质量发展”破解现代化的核心难题。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把“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行动路径聚焦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内生动力。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突破芯片、航空航天等“卡脖子”技术;在生态治理领域,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转型,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当中。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进步,成为我们党发挥利益协调功能,平衡多元诉求、系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以“走和平发展道路”拓展现代化的全球空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与西方大国依靠殖民掠夺实现扩张的“收割型”模式不同,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谋求自身发展,也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强调发展权的普遍性和所有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正当性,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此,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类解放功能,为人类现代化提供超越零和博弈的新范式。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锻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政治优势。从立党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一亿

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是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治国理政水平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表明我们党过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开拓者,未来也必将这一伟大进程的坚定引领者,无愧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关键动力。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主线,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从内忧外患、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彻底告别四分五裂、任人鱼肉的屈辱历史,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十五五”时期“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着强国建设逐步向前,中国人民的长期夙愿日渐接近,实践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突破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桎梏,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改写了世界现代化图景和人类文明发展格局。从出场、发展到创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那些既希望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新的选择,开辟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交相辉映,以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

(作者系六安市委党校教师)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卢君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此加以研究和阐释,对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

**儒家:仁政德治与民本秩序。**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的中流砥柱。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儒家强调“修身、齐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儒家治国理想追求“仁政”和“德政”,即以仁爱之心施行政治,使百姓安居富足,社会和谐有序。孟子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将人民利益视为国家安定兴盛的根本。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崇尚“礼治”,通过礼乐教化来规范社会等级和人际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还怀有“大同”理想,《礼记·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之社会即为人人各尽所能、共享太平的至治境界。可以说,儒家将道德教化、礼乐秩序与民本理念融为一体,构筑了理想的治国之道,为中国古代政治塑造了德治为本的价值底色。

**道家:无为而治与天人合一。**道家思想以老庄为代表,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即统治者应顺应自然之道,不妄为、不扰民,让人民在较少干预下自然而治。道家还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追求简朴自足的治理模式,反对穷兵黩武和繁苛统治,以避免给百姓带来灾难。与无为思想相关,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自然规律进行治理。《道德经》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治国应顺应自然法则,不违背客观规律。总体而言,道家为中国传统治理思想注入了崇尚自然、轻徭薄赋的理念,以独特方式丰富了治国思想宝库。

**法家:法治至上与强国治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以刑罚和奖赏作为规范人行为的手段,要求“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对所有人一律依法规范。他们认为人性本自私利,需要靠法律制度的强制力来约束人性、惩治懈怠,从而保持国家统治的权威和社会的整齐划一。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变法,通过制定清晰严苛的法令和奖励军功,成功提高了国家动员能力和军队战斗力,奠定了秦兼并六国的一统之基。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他强调以法律为治国核心,主张“法、术、势”结合,注重制度规范与权力制约。法家还重视行政效率和官员考核,提出“事断于法”“任人唯贤”。法家的法治理念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重要思想源头,与儒家的礼治并称“礼法两大源头”。

**墨家:兼爱尚贤与务实利民。**墨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创始人墨子及其弟子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治理主张。其核心是“兼爱”,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博爱众生,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关爱他人。与兼爱相辅,墨家推崇“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不论出身贵贱,凡有才能德行者都应提拔担任官职,以此改善治理品质。墨家还提倡“尚同”,要求上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以减少内耗;“天子制天下之义”,各级服从上级,以形成政策的同一性和执行的高效性。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墨家崇尚“节用”“节葬”,反对奢侈浪费和繁缛礼俗,强调勤俭治国、减轻人民负担。

先秦诸子百家尽管路径主张各异,但皆“务为治者也”,追求治国安邦之道。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并非某一家独占主导,而是多种理念互补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精髓在于将道德与法治、秩序与变革、君权与民意等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治国理政思想。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传承与价值

**民本思想的传承: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现当代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儒家等先贤强调的“仁政”“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而合。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执政理念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与古代“政在养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民本思想还体现在基层治理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可以说,传统民本理念在当代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石。

**“德主刑辅”的发展:德治教化与法治建设融合。**中国传统治理一贯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一宝贵经验在当代得到坚持和发展。儒家倡导以道德教化垂范政治,法家提倡以法律制度规范行为,历史上历朝往往采取“德主刑辅”方略,将二者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这一思想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以道德滋养法治生态,为法治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选贤任能的延续:干部治理现代化。**古人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贤任能的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士、察举荐贤、考课黜陟等机制选拔和管理官员,塑造廉能政治。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从改革开放后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到新时代好干部“五个标准”,选贤任能一直是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尺,体现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理念。这正与儒墨尚贤思想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系列举措可以看作对古代“治国先治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秩序与和谐:双重价值追求的赓续。**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长治久安一直是历代治国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在这方面的理念和举措,深受传统“和为贵”价值观和秩序观的影响。儒家倡导通过伦理道德和礼乐教化来实现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减少矛盾冲突,这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提供了文化借鉴。现代治理中特别强调社会公正与公平,这与传统上对“义”与“礼法合治”以求社会公道的理念相一致。今天,中国通过完善法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让规则意识与公德意识融汇,以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在基层治理层面,当代再次重视传统的民间自治与德治智慧。传统儒家的“五伦”伦理在现代被转化为公民基本道德准则,如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均有助于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在当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它既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当今治国难题的历史智慧,又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注入了文化自信和思想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挖掘并利用好这些传统思想遗产,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善治之路,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汉语文字学2024届硕士研究生)

# 以全面绿色转型擘画美丽中国新图景

苏秀珍

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事关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部署,重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推进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 筑牢思想根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增长的旧有思维,真正把生态环境视为内在生产力与宝贵发展资源。

全面绿色转型,首先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必须从思想源头上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将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强化决策机制的生态约束。将生态效益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全面纳入政策评估、企业成本管理和重大项目论证体系,推动绿色涵盖自然资源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绿色GDP”核算与考核机制,使隐性环境成本和长期生态价值显性化,从根本上纠正“重经济、轻环保”的决策偏向。树立发展活动的边界思维。必须在思想深处确立“地球边界”与“生态阈值”概念,深刻认识到任何发展都必须在自然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进行。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人定胜天”的旧有观念,在发展谋划中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作为不可逾越的价值准则和思维前提,从认知源头确保发展不以透支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培育内化于心的绿色文化。仅靠外部约束难以形成持久动力,必须在全社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教育、制度引导与文化传播,推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环保理念相融合,使绿色生活从口号转化为习惯,从个体自觉扩展为集体行动,形成人人崇尚、事事体现、时时践行的生态文明新风尚。

唯有构建“决策评估—价值认知—行为引导”三位一体的思想与行动体系,才能为全面绿色转型注入持续而强大的内生动力,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 夯实发展根基: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协同推进系统变革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全球生态治理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以其为“牵引”,凸显了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统领地位。全面绿色转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发展”,它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系统整体性、结构性的深刻变革,而“双碳”目标正是驱动这一系统变革的强大引擎。

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关键在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四大任务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构成了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实践路径。聚焦降碳,推动能源结构根本性转变。能源领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必须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依托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大幅提升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严控能耗强度,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深化减污,提升生态环境整体质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得新成效。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不断提升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着力扩绿,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生态本身就是资源和生产力。要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增强其固碳增汇能力。推动增长,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全面绿色转型本质是发展方式的深刻革命。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清洁化方向深度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使绿色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和鲜明底色。

这四大任务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必须坚持系统推进,在降碳中提质,在减污中惠民,在扩绿中增容,在增长中转型,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多赢。

## 巩固社会根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建设美丽中国,既需要顶层的战略设计和中观的产业推进,也离不开微观层面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是筑牢生态文明建设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根基。全面绿色转型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单元的自觉行动。

构建绿色制造与循环体系。企业是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的关键主体。应全面推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从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贯彻绿色标准,积极推广生态设计,优先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材料,广泛应用先进清洁生产技术和持续降低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循环体系。同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和绿色标准的引领作用,通过绿色产品标识、环保信用评级等手段,倒逼和激励生产方式全面升级,使绿色竞争力成为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优势。

培育绿色消费与行为模式。公众的消费选择与日常行为习惯,深刻影响着市场导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鼓励引导公众在衣食住行游等各个领域践行绿色选择,优先采购环保、节能、节水产品,拒绝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浪费。政府应加强规划引导与基础设施配套,持续完善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节能建筑标准与改造、废旧物资循环回收体系等,并探索建立碳普惠等创新激励机制,让绿色生活变得更方便、更经济、更受社会推崇。唯有使生态文明理念真正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亿万人民的日常实践,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的生动局面。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铸就的思想根基,以“双碳”目标牵引的发展根基,以及由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构筑的社会根基,共同形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实支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全社会合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画卷,让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作者系淮南市委党校副教授)